

“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张兴国 张兴祥

[提要] 1954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首次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由于历史的机缘,王亚南与李约瑟相逢,并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的关键性环节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他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以比较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考察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对官僚专制政治的独裁性、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展开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中国官僚政治,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王亚南不少开先河的论述和深邃的洞见,可为李约瑟的总结工作提供极有价值的参照,他对“李约瑟难题”所作的理论贡献,将同他的业绩一样永载史册!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经济结构 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3)02-0119-06

王亚南触摸“李约瑟难题”的缘起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剑桥大学冈维尔—凯厄斯学说院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是近代化学胚胎学奠基人、杰出的生物化学家。1954年,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中,首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第1至第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可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①李约瑟提出的上述疑问,在各国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反响,被誉为“李约瑟难题”。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这些理论性很强的问题就已引起哲学界、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关注,各国也不时有学者加入讨论,但因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关中西科学发展失衡的问题未能“浮出水面”。真正

激发国内外学者对中西科学比较予以关注和研究，并把它推向前所未有的阶段，是李约瑟首次正式提出这个难题之后。可以说，“李约瑟难题”是世界文化与文明史上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不亚于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对于沟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的科学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在中外学者当中，王亚南是最早触摸“李约瑟难题”的，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机缘。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代表，接受英国政府的派遣，肩负援华使命抵达中国，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1943年，李约瑟来到当时尚在广东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与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王亚南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扼要的解答。王亚南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此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逼他做出解答。当时，一般论坛热烈讨论的是官僚资本问题，王亚南也在《文汇报》“新经济”栏目及《时与文》杂志上发表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文章，这个问题促使他进一步对中国官僚政治做出科学的说明，因为，在他看来，“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而且，研究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与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将有助于考验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②。

王亚南在着手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时，已交代自己的研究动机，但尚未清楚李约瑟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发生疑难，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王亚南也“不曾问个明白”^③。现在我们知道，李约瑟跟王亚南提这个话题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他要回答自己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提的“难题”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是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性环节。因为，仅仅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历史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首先在西方兴起，这是远远不够的，科技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必须对中西异质的经济结构、社会体制、历史传统、思想体系做出综合的对比分析，才有可能最终破解“李约瑟难题”。毫无疑问，王亚南所确立的研究视角，将为李约瑟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

王亚南的研究视角：以经济结构作为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约瑟也深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它们决定了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否，所以，他在1963年完稿的《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曾把他所提的难题转换为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无论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⑤他认为，“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封建社会的衰亡，那么，近代科学、改革运动及文艺复兴都是不可想象的。”^⑥无庸讳言，王亚南的工作已走在李约瑟的前面。从1947年10月开始，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官僚政治的文章，1948年10月以《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为书名，由时代

文化出版社结集出版，随后，该书的姐妹篇《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于1954年11月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点，同时延伸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领域，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以系统的、全面的考察。他所要说明的是，中国政治形态一直受专制政体——官僚政治支配，这种官僚政治形态把地主经济作为它的物质基础，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得不到突破性的发展，致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

那么，什么是官僚政治？王亚南曾援引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Laski）教授的解释，不过，他在《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一文中，也给官僚政治作了界定，笔者以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兹引述如下：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⑦

王亚南指出官僚政治存在的三个前提：一是前资本主义的或封建的体制仍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二是人民大众被束缚、被限制在宗法社会组织，处于孤立、愚昧、无知的状态；三是整个社会的落后与封闭性，缺乏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上文化上的接触和交往。根据上述思路，王亚南对中国封建制的地主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其上的政治文化等设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经历了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个阶段，而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由秦至清二千多年间，地主经济一直占支配地位，其基本结构要素是农工结合体。中国王朝虽然经过多次的更迭，但总是走改朝换代的老路，不仅没有对中国社会基本经济要素进行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地，每一次政治变动都在设法加强这种结构的顽强性。与此相适应，秦代出现了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治，这种官僚政治形态依附于专制政体，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它具有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三种性格^⑧。每次旧的王朝被推翻，出现的仍是换汤不换药的新的专制王朝，新的官僚系统亦粉墨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又随之复活——中国的历史似乎深陷在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里。王亚南痛言道：“自秦代出现专制官僚统治形态以后，几千年来，那种统治形态，就一直不曾离开过我们。”^⑨是的，中国的官僚政治使封建土地所有者专制君主及其僚属乃至商人、商业高利贷者，在超经济的剥削榨取上形成“统一战线”，因而，“这种封建的地主经济本身，不能为任何新生产方式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而商业、高利贷业虽然破坏了原来所有权关系，虽然把分散的货币财产集中起来了，但却没有形成新生产方式的手段。”^⑩也就是说，中国的地主经济未能在其胚胎内孕育出以个人私有财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

不仅如此，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如学术、思想乃至教育，都沦为政治工具。在封建地主经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体系，是“非现代意识的大民族集团思想”，它自始至终作为配合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而取得其存在的意义。王亚南把儒家思想体系归结为“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之教”，并指出，前者是出发点，后两者是它的应用和发挥。儒家学说就由这三大中心思想支撑着，它们成为配合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的支配意识形态，是维护专制官僚封建统治所缺一不可的。在地主经济、专制官僚统治基本存在的社会秩序下，儒家学说虽也经历了一些不同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通过王亚南的剖析，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就因

为在这种经济形态本身，已经存在着一些使它不易在胎内好好孕育出新生产方式的限制，而以这种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官僚政治组织和儒家学说，更从中作了许多缓和矛盾对立的措施。”^⑩

王亚南研究视角的三个特色

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视角，有三个显著的特色。

一、比较的观点

1946年，王亚南在给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曾谈到发挥自学精神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他说：“读理论的书也好，读历史的书也好，如其尽可能的设法采行比较法……则这种研究方法的采取，就能最展拓我们的视野，增进我们的学力。”^⑪王亚南剖析中国的官僚政治，运用的正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为了说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他对中国与西欧各国的封建制作了对比，认为前者以地主经济为特点，后者则以领主经济为特点，而且，两者在领主经济阶段和地主经济阶段逗留的时间不一样，中国社会停在封建制的时间特别长。在此基础上，他对中西社会、政治、文化的显著差异也进行对比。

例如，因为经济形态的差异，中西的社会变革走的是不同的路子。近代西方兴起的都市工商业者——资产阶级与土地所有者封建贵族，处于你死我活的正面冲突，于是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的地主经济形态，官僚、地主和商人是“通家”，他们之间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因此不可能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每个朝代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奋起反抗的差不多都是农民。至于官僚政治本身，王亚南也是把它放在中西比较的视角上进行考察。他概述了英、法、德、俄等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官僚政治史实，进而分析中国官僚政治的特殊表现，以此揭示推行专制官僚统治的结果：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护——最终，“人治”与“礼治”被宣扬来代替“法治”。再就文化层面来说，即使在官僚专制时代，欧洲的学术、思想和教育仍有其独立性，不曾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中国却不同，在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下，文化中的每一因素与官僚政治达到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

二、系统的观点

王亚南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是把它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对待，他不仅注意它的技术层面，而且更注意它的社会层面，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官僚政治依存于各种社会条件，并被这些社会条件制约着，如果单从技术层面去谋求根治专制官僚政治，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刚开篇点题，王亚南就不是就政治体制论政治体制，而是同其他社会因素一起联系起来考察。他指出，中国官僚政治具有非常突出的包容性，即官僚政治活动同其依存的经济基础，以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艺术等，处于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之中，它们之间是血肉筋骨的关系。事实上，他把社会事象当作一个系统，政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唯其如此，他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立论鞭辟入里。

王亚南选择经济结构作为切入点，一下子就触及中国官僚政治赖以存在的根基。因为，正是二千多年来一直依靠农村的封建榨取作为寄生的营养，中国的官僚政治才得以延续得如此之久。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传统的官僚政治虽改变了一些外形，但作为这个制度依存并活动的旧有的土地所有关系未出现任何本质的变动。不仅如此，他在谈论民主政治时，也是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立论的，他认为现代的民主问题，是经济问题在政治方面的表现；离开了经济问题来谈民主问题，民主问题将会像断了线的风筝，因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落空，“民

主政治之逐渐伸展，逐渐在各方面造成制度的根基，都是在经济要求中，或者，都是通过经济利害关系而演变出来的。”^⑩再就是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王亚南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要是儒家学说）时，认为它在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之间充当“粘合剂”，对于专制官僚政治，从而对于地主经济，“尽了不少促使其巩固和延续的作用”。

显而易见，在王亚南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同构”的，它们已紧紧纽结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的“混合物”。至此，我们才能理解，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学说的独占性，与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独裁色彩，何以呈现出如此惊人的一致性！

三、发展的观点

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向资本制转化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一切现代化了的国家，都曾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因此，它是“一个历史的表象”。他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官僚政治的。从发生到形成完整的体制，乃至在现代出现变形，中国的官僚政治经历了种种变化，简言之，它也有自身发展的轨迹。自秦代开其端绪，经汉魏六朝的磨合、变异和纠偏，以地主经济为支配地位的中国官僚政治逐渐稳固下来。由唐代至清代中叶，得益于两大杠杆——“两税制”和“科举制”的支撑，中国官僚政治制度日趋完备，呈现高度发展的态势。迨至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出现激烈震荡，于是，官僚政治又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为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第二阶段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发生之前，为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接续期；第三阶段由抗战到解放战争期间，为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特别是，当专制官僚政治与国际资本接触后，依靠买办资本的力量，形成“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经济的混合统一体”，在中华大地横行猖獗一时，可谓官僚政治的“回光返照”。

正是以历史的发展的辩证观点，王亚南正确审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他批驳了一些学者的“历史循环论”，尤其是日本军阀豢养的侵略主义代言人秋泽修二所谓“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的谬论（他把停滞性本身看作“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王亚南指出，讲中国社会停滞，是指它没有很快地出现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而言，但绝不应把这个问题绝对化。“停滞”不是长期不发生“变化”，或没有“活泼的活动”，而是由于种种阻碍因素，在社会进步方面的量的积累，尚不够引出质的大变革而已。他深信，一旦铲除了作为其依存的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以民主政治取而代之，中国的官僚政治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王亚南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论贡献

自20世纪中叶“李约瑟难题”提出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科学家、科学史家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为苦苦求索该难题的“终解”而付出不懈的努力。在这些研究者当中，王亚南也许是唯一一个以经济学者的身份介入的。从他的研究动机看，他也不是有意识地冲着“李约瑟难题”来的，不过事实表明，他的研究思路与李约瑟本人“异曲同工”。

李约瑟“并非仅仅着眼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而是把科学史同思想发展史、社会经济发展史有机地联系起来，把他所研究的对象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和社会根源的深度来阐发。”^⑪他“即注重科学发展的内因，又强调社会、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⑫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编写计划看，即将出版的最后一卷（第七卷）也即总结部分，是对传统中国文化做社会和经济结构分析，并且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地位和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

1950年以后,这一卷的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提前发表,我们得以窥见其大体轮廓。李约瑟关于中国“亚细亚官僚制度”的形成及其缺陷,关于儒家学派在官僚政治上的地位及作用,关于商人阶级遭到歧视和压制、商业利润和创业精神受到持续不断的抑制导致中国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等等方面,都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他的结论是:“由于社会性质的原因,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无法像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样蓬勃崛起。”^⑩李约瑟的这些观点,与王亚南比较起来,常常使人产生“殊途同归”的感觉。

当经济全球化成为21世纪不可遏制的潮流,当中西方的交流与对话重新回到平等的起点,中西的科学与文化比较研究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王亚南所作的是前期的基础性的工作,然而,他的学术价值是不应被忽视的,他的两本代表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和《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以及与官僚政治研究相关的一些论文,已率先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诸方面的内在关系展开独创性的研究,进而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滞留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他的不少开先河的论述和深邃的洞见,对李约瑟的总结工作将是非常有益的启示,他对“李约瑟难题”所作的理论贡献,将同他的业绩一样永载史册!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1~2页。

②③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⑤⑥《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社会》,参见英国科学史家克鲁姆比(A.C.Crombie)主编的《科学变革》(Scientific Chang),伦敦,1963年版。

⑦⑧王亚南:《地主经济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王亚南文集》第四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92页、第94页。

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王亚南文集》第四卷,第154页。

⑩王亚南:《论中国传统思想之取得与丧失存在的问题》,《王亚南文集》第五卷,第181页。

⑪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王亚南文集》第四卷,第314页。

⑫王亚南:《如何发挥自学的精神》,《王亚南文集》第五卷,第229~230页。

⑬王亚南:《经济建设在工业化,政治建设在民主化——论民主问题与经济问题》,《王亚南文集》第五卷,第121页。

⑭卢嘉锡:《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序,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⑮潘吉星:《李约瑟文集·导言》,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27页。

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见《李约瑟文集》,第63页。

作者简介:张兴国,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兴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厦门361005

[责任编辑 江中孝]